



下海致富陶朱公

翁礼华 ●

自古以来，中国有无数的神祇。在以利益为诱导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财神则是最重要的神祇。中国的财神有文武之分，武财神为赵公明、关羽，文财神有比干、陶朱公，而财神中依靠自己的才干经商致富，脱颖而出者仅陶朱公一人。

陶朱公本名范蠡，春秋末年楚国宛地（今河南南阳）三户人。在当地，范蠡怀才不遇，轻狂傲世。后遇文种力荐，越王接纳了范蠡。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下越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力日益壮大，越王允常及其儿子勾践开始有了称霸中原的愿望。勾践继承王位后，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积聚了足够的财力、物力和兵力，终于一举灭吴，并乘胜北上，势力达于江淮之间，诸侯毕贺，号为霸王。周天子正式册封勾践为“伯”，成为诸侯之长。范蠡功高盖世，被封为当时越国的最高军职“大将军”，赐会稽良田三百顷，永为俸邑。

但深知“伴君如伴虎”的范蠡预感到成功以后的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为了自身的安全，他决计下海从商。一天他以下基层视察为名悄悄离开朝廷潜入民间，当天在经过无锡东南的五里湖时曾夜宿湖畔农舍，此湖便被后人改名为蠡湖。据说开始他并未远遁，

而是盘桓于苏南大地，出没于太湖之滨，先在无锡鼋头渚落脚，嗣后来到了宜兴隐居。当他看到宜兴鼎蜀地区的泥土粘力强、耐火烧，宜作陶器时，便举资兴窑，创办下海后的第一个企业，拉开了宜兴陶器生产的序幕。为了逃脱勾践寻觅，表达自己献身陶业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姓也改成“陶”。直至今日宜兴境内还留下不少范蠡曾经身体力行发展经济的遗迹。

后来，范蠡埋名改姓在宜兴一带的活动为勾践所觉察，为了确保安全，他不得不远遁他乡，于公元前473年浮海北上齐国。到齐国之初，范蠡隐姓埋名，“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地从事农业生产，由于春秋末年的齐国处于今胶东半岛的沿海地带，社会经济相当发达的诸侯国，富有经商天赋的范蠡不久便受到商品经济的感染，决计易农为商。在下商海的经营中他将朋友计然当年向勾践进献的治国七策运用于商业实践，大致有五个方面。首先，他认为市场行情如阴阳五行，轮回循环，变动不居；大地时旱时涝，谷物时丰时歉，旱时造舟船，涝时修车马，以备后乏。其次，知道战争要爆发，就要积极做好战备；了解各类货物为人需求的时令，才能把握市场行情的变化。再次，商品价格，瞬息万变；物价贵到

极点，必然下跌，贱到极点，必定攀升；当商品昂贵之时，就应毫不犹豫迅速抛出，视之如粪土而不惜；当商品低廉之际，又要毅然决然乘时买入，视同珠玉而倍加珍惜。第四，积贮货物，务求完好，以防日后滞销；易腐易蚀的货物，即使价格再高，也不要长期存留，不能轻易囤积居奇。第五，水纳百川，奔流不息，方能汇成大江大河；货币也是一样，如果让资金积滞不用，就会成为一堆死钱；只有使它周转不息，才能变成与日俱增的利润。这些理财思想不仅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先进理念，即使在今日仍然闪烁着不朽的思想光芒，例如其中的货币流通理论，在中国直到1500年以后的宋人沈括才加以阐述，此时比西方经济思想界还早了几个世纪。

拥有如此卓越超前的经营思想，范蠡自然迅速发家致富，“致产数十万”而名闻齐地。当时十分重视经济发展的齐国国君田常突然发现这个转瞬致富声名鹊起的外来企业家时，不禁为之吃惊，在惊奇之余他兴奋地决定不拘一格启用人才，授予范蠡以相印，想让范蠡带领齐国百姓共同致富。但范蠡考虑再三，还是觉得经商比从政安全且富有价值。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所拥有的房产、财物悉数散发，分

给朋友、四邻，自己则携带少量细软金宝，再次举家迁徙，迅速逃离齐境，来到了位于宋国境内济水南岸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并改名为朱公，便有了陶朱公之名。

陶邑虽然城市不如齐国都城那样宏大，但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处于万商云集之地，百货汇流之所，极利经商致富。入陶邑的陶朱公真是如鱼得水，英雄有用武之地。他通过经营珠宝百货，把自己的商业才能发挥到极致，在赚取亿万金钱的同时，还总结出了理财十八则和致富十二则等一整套理论。其中理财十八则认为：为生意要勤紧，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议价要订明，切勿含糊，含糊则争执多；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欠欠要识人，切勿滥出，滥出则折血本；货色要面验，切勿滥入，滥入则质价减；出入要谨慎，切勿潦草，潦草则错误多；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优劣要攸分，切勿犹豫，犹豫则耗用紧；货物要修整，切勿散漫，散漫则查点难；期限要约定，切勿辄轳，辄轳则交天鄙；买卖要随时，切勿挨延，挨延则机宜失；钱财要明慎，切勿糊涂，糊涂则弊窦生；临事要责任，切勿妄托，妄托则危害大；账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则资本滞；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主心要安静，切勿妄动，妄动则误事多；工作要精细，切勿粗糙，粗糙则出品劣；说明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致富十二则认为：能运数，多寡宽紧，酌中而行；能倡率，躬行以律，亲感自生；能知机，售贮随时，可称名哲；能办货，远货不荷，蚀本便轻；能辩论，生财有道，阐发愚蒙；能用人，因才器使，任事有赖；能讨账，勤谨不怠，取讨自多；能敏捷，犹豫不决，终归无成；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能安业，厌旧喜新，商贾大病；能接纳，礼义相待，交易日旺；能识人，知人善用，账目不负。

由此可见，范蠡经商的诀窍，在于运用市场价格变化来掌握供求关系，采取“贵抛贱收”的经营对策：“贵上极则反贱，下贱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据说，范蠡这套理论不仅使自己致富，还指引着他人致富。例如与范蠡同时代的鲁国一位贫穷士人，曾不远千里，慕名来到陶邑，向陶朱公请教致富之道。陶朱公在充分了解此人特长和结合市场变动情况进行分析以后，为他指引了一条生财之道：“汝谓耕则常饥，桑则常寒，何妨一试五牡之蓄？”这位士人听后茅塞顿开，来到山西临猗之南，择地从事畜牧经营，饲养母马、母羊、母猪、母犬、母牛，果然迅速发家致富，十年之间获利千万金。此人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猗顿。秦国学者韩非赞曰：“上有天子诸侯之尊”、“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

不仅在古代人们学习范蠡的理财

思想可以致富，即使在今天范蠡的理财思想仍然具有借鉴作用。例如在粮食问题上，范蠡认为国家应对粮食市场的价格进行有效干预，提出了“夫粟，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的思想，也就是说，粮食价格涨跌幅度过大会影响到农业生产和工商业（古代称之为末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市场上谷价太贱容易伤农，谷价太高会损及商人，粮价只有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才能达到农商两利。为此，国家要运用“平粟齐物”的市场手段加以调节，即市场粮价高时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卖粮食，粮价太低时，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贮粮食，从而稳定粮价，使“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粮价。●

（作者为财政部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甘肃省金塔县财政局
王新春竹笔书

